

那年今日

1932年1月29日

1932年1月30日《中央日报》上登载了一条消息,宋子文昨晨(1月29日)到京,通电就财政部长职。在电文中,宋子文称“顷以外交严重,国难当头……子文经本党同志之督促,不得已重掌度支,勉济时艰”,可见当时国民政府经济状况陷入困境。而在同一天的报纸上,还有另一条有关宋子文的任命消息。中政会临时会议决定,设立军事委员会,推选蒋中正、冯玉祥等委员,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。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整理

宋子文再度就任财政部长

第一次辞职,仅7天后就复职

宋子文自1928年初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,至1933年10月最终辞去这一职务,为期近7年。在南京政府中,除孔祥熙外,宋子文是任期最长的财政部长。但在这7年时间里,宋子文的财政部长一职,中间有过多次辞职,原因不尽相同。

宋子文第一次提出辞职是1929年8月6日。1929年8月1日,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。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万人,但会上又增至80万人,实际上蒋、冯、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。在此情况下,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,预算不能实行,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,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。

宋子文自1928年以来,通过各种手段,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,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。8月7

日,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。9日,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。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,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。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,宋子文答应复职。8月13日,宋子文在上海宴请银行界,商讨再发编遣公债5000万元,由海外华侨认购1000万,其余的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。当天晚上,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。

第二次辞职是为了配合蒋介石的下野

宋子文第二次辞职是1931年12月20日。1932年1月29日,就是这一次辞职后的复职。

这次辞职,是配合蒋介石下野的一个行动。此前,1931年5月,国民党已经分裂,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“和平统一会议”上,宁粤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: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“四大”,而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,改组南京政府,实现宁粤统一。但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,才去南京。在此情况下,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,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。同日,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,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。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,宋子文于12月20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本兼各职。12月28日,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:孙科为行政院院长,陈铭枢

为副院长。1月30日,改组行政院各部,财政部长由黄海梁署理。

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黄海梁署理财长后,最感棘手的就是财政。当时的财政,孙科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以言财政,几年来债台高筑,罗掘已空,中央收入每年本有4万万,但除还债外,能用之款不及1万万。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,且市面债券价格,不过二三成,即强发行,于事何补?最近财政、税收,每月不过600万,而支出方面,只军费一项,照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,每月须1800万。”自宋子文下台时,黄海梁派员接收国库,未得分元现金,而宋子文还拖欠银行界1000万。黄海梁在财政界既无资历,又无特定银行做背景,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。他曾到上海想筹款1000万,经多方设法,才搞到300万,照当时军政费每月2200万元计算,仅够4天开销。

由于财政无法解决,黄海梁只署理了20多天的财政部长,于1932年1月26日辞职。孙科的行政院长也担任了不到1个月时间,1月28日改由汪精卫担任。孙科和黄海梁下台后,1932年1月29日,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。不久,蒋介石也重新上台,两人重新合作。

后来在1932年6月4日和1933年10月,宋子文又两次辞职。宋子文辞职是由于同蒋介石对政策的分歧引起的。宋子文曾说过“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,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”。



宋子文



1932年1月30日的《中央日报》

民国建筑

中山东路1号:80岁高龄故事多

这里是交通银行旧址,1937年银行西撤时,曾与军队打“车辆官司”

位于新街口广场东北角、中山东路1号的这座敦实的老楼,是古城南京的一个老地标,一座经历过风雨沧桑,房龄逾80载的民国建筑,高大的爱奥尼亚柱、精致的雕花、通透的长窗气度不凡,与周边喧闹的环境相比,显得浑厚凝重,气度不凡。

谷万/文

建筑年代:上世纪30年代
设计者:上海缪凯伯工程公司
承建者:新亨营造厂承建
建筑面积:4187平方米



中山东路1号交通银行旧址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中山东路1号是交通银行旧址。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,最初总行设于北京,1928年迁至“十里洋场”的金融中心上海。1910年,交行在南京成立了它的第一个分行,1935年迁入这幢大楼,时称“京行”,或曰南京交通银行。

因为是分行,所以从储蓄、投资、增股、放贷等金融业务,到捐赠寒衣、友情捐款等社会活动,多到数以亿计款额,少到区区几十元钱业务,事无巨细,都必须不厌其烦地向上海的交行总管理处陈报。因为下辖宁、镇、扬、芜、蚌、徐、肥等行,每日业务、客户,往来公文、信函、电报,多如雪片纷繁复杂,整座大楼始终处于紧张、繁忙的状态之中。

南京交行命运多舛,抗战前夕,1936年8月11日接总行指令:“迩来局势演变日益严重,所有各行处簿据、文件具关对外权利义务,又密码

电本等亦为内部联络通讯重要工具,均应妥为布置以备不测”。考虑到位于白下路的宁行,库房构造非常坚固,为安全起见,便将重要簿据、文件等暂时移置安放那里。

1937年12月中旬,抗战情势紧迫,京行奉命向内地撤退,谁知,竟然发生了事先租用的卡车被军队士兵无端扣押的事件,银行方面委托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出面,设法予以追回,并委派士兵押运,所幸并无损失,这才将银行的账册等要件安全运抵下关码头,装船运至汉口。

南京解放前夕,京行决定于上海设立办事处,1949年1月28日开始办公。办事处也是命运不济,只存身短暂一个月,1949年3月3日,总行又嘱将即日撤回。指令称:“所办事项均属重复,且照目前情形,账务并无移沪办理必要,应即撤回”。

自1935年起,至1949年止,(其中南京沦陷时期,汪伪的“中央储备银行”盘踞这里长达八年时间)南京交通银行在这座大楼驻守了约六年时间,自南京解放以后始,这里就成为江苏省工商银行的办公处所了。

眼下,这座见证南京近代历史的,饱经风霜的民国建筑,已经进行了“修旧如旧”式的大规模改造,修葺一新的老建筑焕发勃勃生机,正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。

南京微史

朱元璋为禁酒不许种糯米

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注重节俭。1358年,为避免民间酿酒使用大量粮食,朱元璋颁布了禁酒令。当时,江南酿酒,喜欢使用糯米,为此,在1366年,朱元璋又明令禁止民间种植糯米。

有关朱元璋颁布禁酒令和禁种糯米的事情,在顾炎武的《日知录之余》卷二有记载:《太祖实录》:戊戌年(1358)十二月,下令禁酒。丙午年(1366)二月,下令禁种糯。其略曰:“予自创业江左,十有二年,德薄才菲,惧弗胜任。但以军国之费,不免科征于民,而吾民效顺,乐于输赋,固为可喜。然竭力畎亩,所出有限,而过取之重,心甚悯焉。故凡有益于民者,必力行而申告之。曩以民间造酒醴,糜米麦,故行禁酒之令。今春米麦价稍平,予以为颇有益于民,然不塞其源,而欲遏其流,不可得也。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,以塞造酒之源。欲得五谷丰积而价平,吾民得所养,以乐其生,庶几养民之实也。”

在朱国祯的《涌幢小品》中,也有类似记载。

禁酒令颁布后,朱元璋要求严格执行。可是大将胡大海的儿子,却公开违令。朱元璋知道后,不顾胡大海正领大军出征在外,亲自手刃胡大海之子。自此以后,无人

敢再触犯禁酒令。

这件事情,《明史》中有记载:初,太祖克婺州,禁酿酒。大海子首犯之。太祖怒,欲行法。时大海方征越,都事王恺请勿诛,以安大海心。太祖曰:“宁可使大海叛我,不可使我法不行。”竟手刃之。及关住复被杀,大海遂无后。

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下,浪费粮食的现象减少,小麦价格走低,更多的百姓能吃饱饭了。朱元璋也因为体恤民情而广获人心。不过,后来,随着朱元璋的离世,他和他的禁酒令也渐渐被后人遗忘,酿酒、卖酒、喝酒一切照旧了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



古人用粮食酿酒